

游
信
利
著

史記方法試論

文史叢書
出版社印行

游信利著

史記方法試論

文史哲出版社
印行

史記方法試論

著者：游 信 利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實價新台幣一八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序

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梁啟超先生撰中國歷史研究法引孔子語作序云：「吾治史所持之器，大略在是。」中國歷史研究法是中國史學方法論的濫觴。今天大學歷史系大多有講授史學方法論的課程，即可表示史學方法論的價值，已經普遍受到學者的肯定。

溫徹斯特文學評論原理說：史之成為文學者，正視其激動感情之力為何耳。而左傳史記之為文學，乃古今所公認，其故是左傳史記敘述結構，多訴諸感情耳。本來，文學的表達與歷史的記載，亦有其區別，前者目的在於求美，詞章愈優美，旋律愈起伏越佳；後者目的在於求真，故事愈近事實，愈近真理越好。易言之，前者為抒情動感，後者為傳知表信。就其語言而論，前者為負荷情意的江流，後者為裝載概念的舟車。然而二者並非絕對衝突的，譬如左傳史記即將二者兼容並蓄。歷史既然能講究方法論，文學何嘗不能！德哲卡西勒(Ernst Cassirer)於人文科學的邏輯說：「人類文化之作品或成果，是具有自然物質性的；而創造這些作品的個體，亦是具有其自己的心靈存在和其自己的生命的。而這一切是可以而且

是應該被置於一些物理學的、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範疇之下加以研究和探討的。」（頁七九）又說：「它們（物理學、歷史學、心理學）之中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觀點，可以把吾人於人文科學中努力尋求的那一全相（Totalbild）掌握和顯示。」（頁九九）

由此可知，與史學表裏爲用的文學，亦有講究方法論的必要。既然文學主要原素是感情，而感情又透過想像表現出來。想像與幻想不同，它是有理路可尋，幻想卻是雜然紛陳。何謂文學方法論？簡單地說，就是與各科合作，汲取他們的知識。文學既分散文與韻文，而韻文又分詩、詞、曲。茲舉例說明於后：

一 韵文

1. 詩

李唐以詩著名，而唐詩又以盛唐爲盛，盛詩要算李白、杜甫爲巨擘。李有詩仙之稱，杜有詩聖之名。有名必有其實，李詩的風格是飄逸，杜詩的風格是沉鬱。他們人格與風格之所以如此，就心理學言，李是表現個人意識，杜是表現社會意識。原來他們受不同的教育文化，李受老莊思想影響較深，無睹於社會，只有關心個人；杜則受儒家學說薰陶較篤，有「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」的同情心，愛護社會。

2. 詞

踏莎行 郴州旅舍

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
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爲誰流下瀟湘去？
冷齋夜話云：「東坡絕愛其尾兩句，自書於扇曰：少游已矣，雖萬人何贖！」

王國維云：「少游詞最爲淒惋，至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，則變而爲淒厲矣。
東坡賞其後二語，猶爲皮相。」（人間詞話）

東坡是秦觀的師友，對時代背景與少游個性的瞭解遠過王國維，因此，東坡的見地不容忽視。此闕後兩語是表示一個轉機，露出一道曙光，亦是一線希望。東坡絕愛後二句，應該基於此吧！一個人的遭遇無數重的恨，如果再堆積下去，情何以堪！

3. 曲

今以馬致遠的題西湖套曲爲例，本篇以套曲爲體裁，以西湖爲題目。我們讀馬致遠的曲，照孟子的理論要先知人論世。他的事蹟不易詳考，從一般筆記只知片斷。我們從他的作品所獲知亦是一鱗半爪，可是欲瞭解他則此資料相當可貴。從中可揣測他的個性與身世，亦即知人論世。

本篇既以西湖爲題，當然敘西湖之景與隱居西湖之情。此時年屆知命，且又兒婚女嫁之

後。哨遍道：「半世逢場作戲，險些兒誤了終焉計。白髮勸東籬，西村最好幽棲。」此處說出歸隱的原故，與歸隱的處所。前者，「半世逢場作戲，險些兒誤了終焉計。」原來他抱怨一事無成，歲月虛度。青杏子云：「世事飽諳多，二十年漂泊生涯。天公教我平生假，翦裁冰雪，追陪風月，管領鶯花。」他由於官場不如意，或是種族歧視，仕途一直沉而不浮，於是「追陪風月，管領鶯花」，從應立至知命，虛渡光陰，幾二十年之久。清江引：「東籬本是風月主。」，他不僅是風月主，而且是酒中仙。他最崇拜陶淵明的爲人，認定杜康爲忘憂物，他的名號也取自陶詩「採菊東籬下」之東籬。題西湖正是反映上述思想，可區分爲三部曲：首段敘述西湖山水秀麗，隱此之故不言而喻，中段對往日「酒中仙」、「風月主」依然眷戀難以忘懷，後段絢爛歸於平淡，安於「林間友」「塵外客」。

二散文：一般分記敘文、議論文、抒情文、應用文，它亦涉及政治、經濟、歷史、地理等問題，所以非熟悉政治、經濟等不可。譬如黃宗羲的原君，黃先生是歷史學家，他不但熟悉明史，甚而熟悉整個中國史。他區分中國政制爲古今兩階段，古代是「公天下」，現今爲「家天下」，他認同公天下而唾棄家天下，他的見解與今天的學理有頗多暗合：

1. 公天下之君是基於其對團體的貢獻能力而決定者。因爲他們要「爲天下興利除害」，「

必千萬倍之勤勞，而已又不享其利。」反之，家天下則訴諸武力，馬上取得，而馬上治之（武力統治）。

2. 公天下君與民之間，無利害對立或矛盾，同質性較高；反之，家天下之君，既壟斷物質價值，「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，受享無窮。」因此，君與民之間，利害對立與矛盾。

3. 公天下君與民之間，社會距離很近，存在著密切的感情關係。「古者天下之人，愛戴其君，比之如父，擬之如天。」反之，家天下又如何？「今也天下之人，怨惡其君，視之如寇讎，名之爲獨夫。」

4. 家天下之政權轉移必通過流血革命，「既以產業視之，人之欲得產業，誰不如我？……其血肉之崩潰，在其子孫矣。」而公天下則是禪讓政治，顯係和平轉移。

5. 家天下之君，力求神秘性格，保持其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。其一些學者提倡「以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至桀紂之暴，猶謂湯武不當誅之，而妄傳伯夷、叔齊無稽之事，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，曾不異夫腐鼠。」黃先生認爲公天下，理論上是孟子的民本思想，實際上是湯武的弔民伐罪。

當然，今天民主政治，以民主爲一種生活方式、制度化等，爲黃先生所難以夢見，但是

生於三百多年前的黃先生有如此卓見，誠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本篇取名「史記方法試論」是筆者不度德量力，嘗試之所作。所謂嘗試是嘗試——錯誤——改正——成功的過程。由於筆者承擔錯誤的嘗試，以致後賢獲得成功的果實。史記是中國紀傳體不祧之祖，史記方法論既通，其他二十四史亦無所不通。況且，中國文學系所講授的課程不少是史學，譬如中國文學史、哲學史（學術史、思想史），由文學史衍生詩史、詞史、戲劇史、小說史，又由哲學史細分為魏晉玄學、隋唐佛學、宋明理學。再說，章學誠云：「六經皆史也」。總之，史記方法論的講究，對於上述學科的啓迪，實不容吾人忽視。

史記方法試論 目次

第一章 研究動機·····	一
第一節 緒論·····	一
第二節 下筆如有神·····	五
一、行萬里路·····	六
二、破萬卷書·····	一七
三、下筆如有神·····	二二
第三節 時空整體觀·····	二七
一、歷史時間·····	二七
二、歷史空間·····	二九
三、歷史整體·····	三一
第二章 史記方法試論·····	四九

第一節 試論正言·····	四九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太史公如何搜集史料·····	五一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諮訪名流學者或當地耆老法·····	六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查閱全國公私藏書·····	六三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、遊行各地探訪搜集法·····	六五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後人如何審訂史記·····	六七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史記外形的審訂·····	六八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史記內容的審訂·····	七九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 現代史記的整理和批判·····	九〇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、人文科學·····	九四
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社會科學·····	一〇四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三章 方法論結論·····	一二五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、太史公如何搜集史料·····	一二二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後人如何審訂史記·····	一三五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、現代對史記如何整理與批判·····	一三八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參考書目·····	一五三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研究動機

第一節 緒論

「方法論」(Methodology)，是解析「方法」的理論，其目的是批評科學致知的方法，探討客觀知識成立的可能性及其條件，建構系統化的科學理論。而所謂「方法」(Method)是一套獲致科學知識之研究程序。以邏輯術語為喻，「方法」屬於「對象語言」(Object Language)，亦即「第一層次語言」(first-Order Language)，指涉的是…演繹法、歸納法、比較法、統計法等等。而方法論則是以這些「方法」為對象，求研究它們的功能與由之得來知識的性質，因此為「後設語言」(Meta Language)，亦即第二層次語言(Second-Order Language)。二者顯屬於不同層次的知識。

近代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啓迪者，首推德儒韋伯(Max Weber)。他對方法論的反省，除「羅契爾與科尼斯及歷史上的國家經濟的邏輯問題」一篇外，尚有「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中

的客觀性」(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)、「文化科學之邏輯的批判性研究」(Critical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Cultural Science)和「社會學以及經濟學中的道德中立之意義」(The Meaning of Ethical Neutrality in Sociology and Economics)等等。至今猶膾炙人口而為後人津津樂道的二種特殊方法——亦即「領悟法」(Verstehen)以及「理想類型」(Ideal types)的建構工作。(註一)總之，韋伯學術領域極為廣闊，不僅在中西歷史研究均有原創性之貢獻，而且在社會學範疇允稱一代宗師。從此以後，探討方法論，辯析方法論蔚為一時風尚。一直到今天，未嘗稍懈。他們所關注的重要課題諸如自然科學的方法是否應用於社會科學，它們之間有否本質上之差異，社會科學的概念模型(Concept formation)和理論的概化(Generalization)問題等等皆是。一言以蔽之，都是屬於科學底哲學的範圍。

今天，方法論對於學術界到底有何功用呢？Paul F. Lazarsfeld認為方法學的工作對於社會科學底進步可能有四點貢獻：

- 一、給年輕的社會科學以形式的訓練，使他們把社會研究工作能做得更好。
- 二、增進社會科學家對付新來的和不熟悉的事實之能力。
- 三、對於科際整合的貢獻——作精細而又深入的比較各科異同所在，以便有利於整合。

四、提供吾人以整合和編纂所增進知識之組織原則。

雖然，Lazarsfeld 重視方法學底功用，然亦不忽略實際研究工作，他說：

我們誠然注重方法學底功用，可是這種態度不應導致我們過分高估方法學底功用，或者低估具體實質研究工作之重要。（註二）

一些學者的研究之所以呈現弊端，正是高估方法論，而忽略具體實際研究工作所致。要知道：書本上所談的「方法」是屬於「重建邏輯」(Reconstructed Logic)而實際研究過程步驟，則屬於「應用邏輯」(Logic in use)當然最好的方式，是「重建邏輯」與「應用邏輯」合而為一，理論(Theory)與實踐(Practice)協調配合。事實上，那是不容易之事；不過，只要我們能夠取其長去其短，則方法論的價值是存在的。譬如正受訓練而欲圖獲得必備智識和思想方式的初學者，接受方法論的訓練，其價值固不待言。至於正積極從事研究工作而原創力極強的學者，受惠於方法論亦必相當有限。可見方法論訓練之利弊得失，則因人之資質而異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
方法論之講究是否是各科目充足且又必需條件，自然科學該獲大家無異議通過的，社會科學贊同者必屬多數，人文科學則不然，反對者佔優勢。介於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史學又是如何？

欲回答此問題，我們必須從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歷史來瞭解。亦即以歷史來解答歷史，而不訴諸表決。西方史學首先輸入中國的，爲歷史進化論。嚴復於一八九八年譯赫胥黎（T. H. Huxley）的天演論（*Evolution and Ethics*）。其次，梁啟超於一九〇二年發表一篇「新史學」文章，就應用西方史學來批評中國史學作品，認爲中國史學有四蔽二病。他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二〇年三月遊學歐洲，而巴黎爲歐洲學術中心，當然要停留相當時日。梁氏於此聘請法國第一流教授專題演講，時正是西方史學方法論最爲盛行之際，有「西方史學方法論鼻祖」之稱的班漢穆（Ernst Bernheim）於一八八九年出版其大作「史學方法論與歷史哲學」，法國史學家朗格諾瓦（Charles V. Langlois）與瑟諾博（Charles Seignobos）繼之於後於一八九七年合著「史學原論」。他所聽講的各門學問，史學方法或許亦是其中之一。一九二一年他在南開大學演講「中國歷史研究法」，翌年予以出版。其書中內涵有不少與朗、瑟合著「史論原論」之見解相符合者，足見梁氏受朗、瑟二氏影響之深。（註三）接著胡適引進西方科學治史方法，何炳松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歷史研究法一門，利用美國史學家魯賓孫（J. H. Robinson）的「新史學」（*The New History*）原本爲教本，直到民國十年「新史學」的譯本始告問世。總之，自從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以來，迄今已逾花甲之年，其間歷經史學先覺之努力，使得今日已著有成績，我們學校圖書館書架上史學方法論

之書琳瑯滿目，就可以想見。史學有需要講求方法論，如今總算受到一些史學者加以肯定。而後，由於科學日新月異的激盪，或許能刺激史學開拓更高深的領域。

史學方法論既已漸漸受學者矚目，筆者忝爲文史工作者豈能不受感動奮發而允爲之驅馳？然則爲何以史記爲題目？史記不但是正史紀傳體不祧之祖，而且是唐宋古文運動著作之圭臬。首先就史而言：司馬遷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爲全史。本紀以敘帝王，世家以記侯國，十表以繫時事，八書以詳制度，列傳以誌人物，然後一代君臣政事，賢否得失，總彙於一論之中。（廿二史劄記）今天的二十四史皆溯源於此，只要我們深體「史記」精微所在，他史自可迎刃而解。其次，就文而論，韓愈便稱柳宗元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，可見史記具雄深雅健的風格。曾國藩云：「自漢以來，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。」曾國藩贊美史記形式之文，而不提其內涵之史。今人李長之喻史記爲中國的史詩，亦同一旨趣。（註四）總之，司馬遷是行萬里路、破萬卷書，成就一位下筆如有神的人；史記是把握時間問題、空間問題，以及整體觀念的一部書，下二節即針對「下筆如有神」與「時空整體觀」兩個主題展開。

第二節 下筆如有神

杜甫自白詩云：「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」他認爲他自己下筆如有神，得力於讀書破萬卷。我們從他的傳記來瞭解，他讀書破萬卷，可靠性相當高。不過我們再進一步研究，行萬里路亦是其條件之一。他弱冠便遊吳越，而後赴京參加科舉，不幸落第，乃遊於今山東、河南、山西一帶，與李白、高適等詩人，往來唱和。安祿山之亂後，他舉家遷蜀，依靠同鄉劍南節度使嚴武。嚴武死後，他又再度飄泊，由戎州、渝州、忠州而至夔州。一年多後，又繼續順江而下，經江陵、公安而至岳州。次年，溯湘江而上，至耒陽傷食而死，年五十九。行萬里路所獲得的是第一手寶貴的經驗，他之所以成爲詩史、社會詩人之尊榮，其資料都得之於此。讀萬卷書所獲得的雖是間接經驗，但對於作家依然相當重要。杜甫的這句自白詩，對於他當然合適；今天，我們就借用它來評論司馬遷。

一、行萬里路

司馬遷於史記云：「余嘗西至崆峒，北過涿鹿，東漸於海，南浮江淮矣。」（五帝本紀贊）可見他一生的足跡遍於整個中國。說他行萬里路絕非誇口。

（一）南浮江淮

太史公自序：「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闢九疑，浮沅湘；北涉汶、泗，